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鲁迅与中国 现代文学批评

陈方竞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鲁迅与中国 现代文学批评

陈方竞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陈方竞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8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9241-2

I. ①鲁… II. ①陈… III. ①鲁迅研究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10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0937号

书 名: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著作责任者: 陈方竞 著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241-2/I·23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824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7.625 印张 442 千字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

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的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目 录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1
鲁迅、胡风与茅盾 1930 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之比较·····	312
鲁迅杂文及其文体考辨·····	401
附录	
中、韩鲁迅研究比较与“东亚鲁迅研究”建构·····	462
我对“新国学”的思考与认识·····	496
后记 ·····	531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涵盖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内涵,我们研究的整体框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仍然很不相称。一个明显的例子,杂文创作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中就无法得到切合实际的说明。我在本文中主要针对的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还难以与小说、诗歌、散文和话剧一样进入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中。在我们的文学史教材中,最初,文学批评是被作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或文学思想斗争)”介绍的,后来的教材则多以“文学思潮与运动”概之;这些在我们的感觉中愈来愈有类“鸡肋”的内容,在我们的文学史教学中,愈来愈成为可有可无的薄弱环节,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教学反映了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现状。温儒敏教授在1993年就以逐章介绍批评家的形式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近年来我所见到的有刘锋杰教授所著《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和周海波教授所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类似的研究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①

^①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中国现代文学之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独立形态有充分的认识,这种独立形态更突出体现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上。在汕头大学2006年1月9—11日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钱理群先生在与我交谈中提出,中国现代文学较之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更是一部“大文学史”,即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批评、作家生活种种方面的文学史。王富仁先生早在2003年就有写一部“大文学史”的构想。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并非是中国现代文学可有可无的“肉”，而是贯穿始终的“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至今尚难以从中国现代文学中超脱或抽象出来获得独立阐释，在整体上尚不具备自己独立的理论形态，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化，离开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认识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这种情况，在整体上是有明显差异的。中国先秦儒家、道家、法家等和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些美学家，通过对当时的文学艺术的研究，在观念形态的抽象中建立起中西文学艺术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他们的理论创造使此后的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发展，不再仅仅建立在对文艺创作的整体感受和认识之上，同时更是在逐步完善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①，并且逐步被整个社会文化吸纳而能够在社会上得到普泛性表现，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发展^②，这就使得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阐释，结

① 为鲁迅所重视的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则与此有些不同，更是着眼于欧洲 19 世纪文学创作呈现的新的因素，对其源流和趋向展开的一种文学批评，孕育着思想理论学说的更新，这有些近于中国的情况，这种文学批评在欧洲文论中并不居于主流位置，在我们对西方文学批评的认识中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鲁迅对勃兰兑斯这部著作的重视，是建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之不同于西方的形成和发展特征的认识之上的。

② 例如中国古代六朝文论摆脱经学束缚所崇尚的“药、酒、女、佛”，在魏晋时代整个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就有普泛性表现。刘勰的《文心雕龙》从“原道”“征圣”“宗经”出发阐发文学理论，既是对中国古代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同时又独占地阐释了六朝文学切合文学自身特征的创作；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要“文起八代之衰”，所针对的既是魏晋时代的文学，又是魏晋时代的社会风气。又如欧洲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了文艺观及文学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与欧洲社会整体上的变化相适应的，所以，这些体现不同文艺观的文学艺术都能够逐渐浸润于整个社会生活中而得到普泛性表现。

合或者游离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文学,在整体上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差异,都能得到具有整体理论框架和相对统一审美标准的说明;所以,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伍蠡甫先生的《欧洲文论简史》虽然是对西方历史上的文艺观的梳理、概括和总结,但显而易见,这些文艺观与思想理论学说一样,在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广泛的影响,郭绍虞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也大致如此,儒、道、法家以及汉魏之际进入中国的佛教,既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影响深远,又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不具备这种社会性,在中国社会中明显缺乏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批判中发生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鲁迅 1929 年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演讲中提出“政治先行,文艺后变”^①,反映了他经历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对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切实感受和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突出特征的认识。鲁迅逝世后,无论是抗战文艺的出现,解放区文艺的形成,还是揭开 1949 年后文艺序幕的《大众文艺丛刊》的意识形态话语批评,以及 1956 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是以 1965 年末“批判《海瑞罢官》”为信号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 1978 年后的新时期文学,等等,无一不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体现,体现了文学批评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联系,

① 《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本书后面有关鲁迅著述的引文均出自此版),第 4 卷第 134 页。“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贯穿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今后的中国文学的每一点点微小的变化,也仍然是这样的。

体现了这种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文学批评仍然不可能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超脱和“纯化”出来,更主要的是,这说明了“五四”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特殊艰难性,需要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进行重新思考,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较之西方的特殊形态认识之不足,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有价值和意义认识之不足,原因之一,我认为,是我们对鲁迅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文学革命是在文学批评与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学术批评相结合的基础上发生的,或者说,文学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时至清末的中国文学发生蜕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及其推动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五四”后文学革命发难者发生分流,陈独秀和李大钊转向了政治革命领域,胡适后则向学术研究领域发展,虽然他们仍然对社会文化领域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影响,但他们已不构成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实际发展的中坚力量,在这时候,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倡导者无疑更多承担了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任务。如果说鲁迅在“五四”时期主要通过小说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那么,他“五四”后明显转向以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创作为主^①,更是通过杂文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他的杂文派生于“五四”的“随感录”,而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上始终与“五四”紧密联系,同时,他“五四”后的杂文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文学批评,是结合“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展开的文学批评,这个特点在他

^① 《两地书·十七》,《鲁迅全集》第11卷第63页。

1928年后的创作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①，即他几乎完全以杂文创作为主，他以杂文为主要方式的文学批评也更为纯熟，直接推动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显然，鲁迅终其一生开展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缺之不可的重要内涵，是中国现代文学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发展的重要保证。^②

对鲁迅的文学批评认识之不足，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以欧洲文学批评为标准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难以承认“五四”后新文学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是文学批评，难以认同鲁迅针对社会现象在文艺界的表现展开的批评是

① “1928年后……鲁迅基本停止了他前期更注重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向其他两个方面有更大的发展，其一为杂文，他的杂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特点更为突出，1930年他明确提出‘我们要批评家’——‘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反复强调‘文坛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他把文学批评放在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其二是他更加重视外国文学翻译，他在1929年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演讲中重申他的《青年必读书》主张，说：‘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介绍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他后期把翻译看得比创作还要重要，主持创办了《译文》，组织、支持青年作家从事翻译，针对文学翻译中的问题写了相当多的文章，他自己的翻译作品较之前期也明显增加。我认为，鲁迅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是时至今日鲁迅研究的两个薄弱环节，是后期鲁迅研究得以真正展开的关节点，同时也是深化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联系的关节点。”（拙作：《需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但是，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著，在整体上还未能对鲁迅的文学批评给予充分的注意和重视。周海波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设立了“鲁迅与批评的社会化、杂文化走向”一章，并在该章中首先提出需要对这样一种“文学批评”进行“重新认识”，我在《历史·现状·趋向：200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中由于文字量的限制未能对他的这一重要见解加以评述。但综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著可见，我们更是依照西方文学（或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批评家”和“正宗文学批评”的标准来梳理和概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而很少从鲁迅的文学批评出发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文学批评,更难以承认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独立形态认识之不足的表现。在这里,可以结合“五四”后鲁迅与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来说明。这场论战既是“五四”后分流的社会文化与学院文化针对社会问题(女师大事件)发生的一次正面冲突,又是鲁迅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学观的较量。被章士钊称为“当今通品”^①的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那些《闲话》摆出的是一副英国“绅士”腔调,他和徐志摩都曾留学英国,研究过莎士比亚,深通英国文学,就以“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②自炫,认为鲁迅的杂文“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③,徐志摩相附和,把他们的文学观说得更为透彻:“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④鲁迅则有“‘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回答^⑤,并且在文章中说:

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官里有这

① 章士钊:《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2号,1925年7月25日。

② 陈西滢:《听琴》,1925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

③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

④ 徐志摩:《汉姆雷德与留学生》,1925年10月26日《晨报副刊》。

⑤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71页)

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①

陈西滢接近周作人,在学院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中都有其贡献。但在“女师大事件”中陈西滢更是立足学院文化立场对社会文化现象展开批评,他与鲁迅的论战,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一次文化批评较量。显而易见,陈西滢的批评更是从道德主义出发的,体现的是中国传统道德非难的特点,利用传统道德进行人身攻击^②;鲁迅批评陈西滢是对事不对人,如他的《坚壁清野主义》、《寡妇主义》,针对的是中国社会中盛行不衰的传统道德在陈西滢文章中的表现,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精神的体

① 《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② “陈西滢本与‘女师大事件’无关,他是主动介入的,在《现代评论》1卷25期(1925.5.30)上发表《闲话》,题为‘粉刷毛厕’,用语在‘我’与‘我们’之间变幻,却又好像是与事无关的第三者,说‘女师大的风潮’‘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于是打了一个比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然后在故作懵懂的言辞中,以打抱不平的口吻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再例举出鲁迅等七教员支持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宣言’中的话,仍以那种口吻展露机心,说‘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其实道学家的立场与态度,在题目和那个比喻中已经一清二楚,却要摆出这样一幅腔调,即‘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拙著:《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陈西滢在那封著名的《致志摩》的信中说:‘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他有‘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见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镌》)——不仅是以‘官’奚落,而且加之以为顾亭林置为‘天下之大害’、‘百方虎狼’、‘窟穴’的自京师各部至各级地方衙门的绍兴师爷(《郡县论》)之恶名,这显然已经不是据理争辩,而是故意混淆公、私行为而借道学家的‘道德’制裁以灭口,但却居然还摆出一幅‘绅士’腔调,可见其拙劣。”(同上书,第207页)

现。其实,从“陈西滢现象”可见,在“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①,“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②的中国社会,哪有在我们感觉中那种西式的“纯文学”和“纯文学批评”;而且,在当时包装着英国绅士的“费厄泼赖”而显俏皮幽默的陈西滢的文化批评,较之鲁迅,在中国显然更有社会文化基础,鲁迅对陈西滢的批评不能不结合“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展开。1996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列出围绕鲁迅一生发生的论争就有39次,每一次都不能说是“纯粹”的文学论争,无一不因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问题而发生,但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更是在这一场场论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些论争中,鲁迅创造了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出发展开文学批评的一种文体,这就是他的杂文,他在充分显现这种文体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地显现了这种文体体现的新的审美形态,他的杂文向社会传递了在中国更具有现代性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意识。这在本文中将进一步深入地给予说明。

二

对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之不足,还有一个我们至今也无法回避的原因,就是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批评特别是文学论争的“芜杂性”,认识其形成根源和表现,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鲁迅结合“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展开的文学批评,与这种“芜杂性”的直接对立性质,并且在这种对立中确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严肃性,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① 《热风·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44页。

② 《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芜杂性”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根源于贯穿本文论及的中国现代文学形成和发展之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特点。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整体比较中产生,并确立了自己的根基和特征,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又迥异于它之产生所整体观照的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即中国现代文学重新确立的根基和特征不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中,亦不在西方文学传统之中,是有其独立性的,这同时又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根基得以形成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以及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的有限。

更主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又是一个“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古今中外的事物“摩肩挨背的存在”^①的社会,中国现代文学在社会文化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能不是在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侵蚀和挤压中的有限性存在,这是在“一步一血痕”的艰难发展中的有限性,是不能不依附于社会文化存在而又时时可能因此而丧失自我主体的有限性。最明显的事实,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种种社会现象,如“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②,如以“核心期刊”为主的“论文大生

① 《热风·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44页。

② “众所周知,长篇小说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是对作家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考验。正因为这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才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在当下,我们却看到许多作家却把长篇写作看得极其容易和简单。有些作家的文学修养和文学素质恐怕连一部中短篇小说都写不出或根本就不会写,但长篇却已出版了多部。因此,从表象来看,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一部接一部的作品,一个又一个的作家,各种风格、各种形态的长篇小说文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相继登场。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长篇小说的‘繁荣’就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文学事实。然而,这种‘繁荣’是一种需要认真辨析的‘繁荣’,它的‘泡沫’质地和‘神话’性质可能会导致对影响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那些真正问题的掩盖与遮蔽。说得耸人听闻一点,我甚至觉得,我们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确实‘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其中至少有不于一半的所谓长篇是地地道道的垃圾。而且,即使抛开那些‘垃圾’性质的长篇小说不谈,(转下页)

产运动”体现的“学术繁荣”^①，这些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受和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生成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发展之不足，不能不使我们感受和认识到确立于“五四”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时至今日发展之不足。

还应该看到一个至今我们仍缺乏认识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由于新文化资源之不足而带来的“职业竞争”之激烈，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从1905—1917年，中国科举制度及依附于科举制的书院，包括科举制衰落而衍生的学堂，不再起到维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职业分配的中枢作用时，中国年复一年从消解中的固有教育体制中蒸发出来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就存在着一个在社会上谋求生存和出路的严重问题。“五四”后正值青春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几乎别无选择地涌入到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五四”生成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之不足，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出现的新式教育、出版等机构，尚难以满足如此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安身立命问题，这种状况不能不带来新文化、新文学职业化发展要求与“知识青年过剩”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更是一个因“人口过剩”而导

（接上页）那些水平线以上的长篇小说也仍然面临着诸多危机与困境。”（吴义勤：《关于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热”的思考》，《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①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研究各学科兴旺到了畸形膨胀的程度，每年生产出数以千计的专著和数以万计的论文，形成了名符其实的大生产运动。资源短缺而信息过剩的中国，需要这么多专著、论文吗？……高校体制的职称制度、课题制度、评奖制度支撑着大生产，标准化、程序化、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鼓励着大生产，高校教师成为半职业化的论文生产者。那许许多多经过繁琐论证的重复课题，似乎都有意义，似乎都有价值，但谁能说得清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课题下的‘研究’有一套可以熟练掌握操作的程序，能够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而网络的广泛应用又为生产者提供着前所未有的便利。……当文章被命名为‘成果’，文学研究者更重视的是文章本身还是由文章连锁获得的各级职称各类奖项各种头衔以及所能换来的呈递加性的物质利益？当被评论被研究的作品被叫作‘材料’，文学研究者还把阅读视作享受吗？在匆忙甚至无奈的生产过程中，文学研究者会感受到激动或者愉快吗？那么，文学研究者还热爱文学吗？还喜欢文学吗？还对文学怀有兴趣吗？”（刘纳：《在学术论文的大生产运动中想起李健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致的“职业竞争”问题。

如沈雁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1921年后如“尼罗河的大泛滥”涌现出来的大量新文学社团和期刊,在整体上可以说是严肃的,显示了经历“五四”变革后的中国文学不可逆转的发展,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种状况也是被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撑”起来的,即当时几乎每一个社会上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在校学生,都希望通过新文化、新文学谋求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出路,但他们又并非对新文化、新文学有真正的理解。“结胎”在前、期刊晚出的创造社作家从日本回国后,直接面临的的就是来自中国社会的生存压力,他们所以与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之间达成“缺少明确‘说法’的合作关系”^①,所以与立足本土而具有先天优势的文学研究会“打架”,都与“五四”后新文化空间的有限和新文学职业化引起的“职业竞争”相关,这在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②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而且,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围绕文学的“功利”与“无功利”、“为人生”与“为艺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争论也可看出,他们所能够从“五四”发展出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的有限性,这不能不带来他们的文学批评(包括文学创作)“芜杂”的一面。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

① 参见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第四、五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